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演进中的观念因素

王学军[1]，杜彬伟[2]

（1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2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观念因素的认识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而不断演化。早期理想主义者奉行观念至上论，卡尔“道德现实主义”奉行观念与物质的折衷主义。随着现实主义的逐步精确化和科学化，观念的作用几乎被完全忽视，观念因素也逐步被排除到国际政治研究和关注的视野之外。冷战后，随着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观念因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得以复兴。观念为人们观察和理解国际政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关键词] 观念；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8)01-0007-06

在国际关系研究历程中，对观念因素的认识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早期理想主义的观念至上论，到卡尔的观念与现状的折衷主义，早期的国际关系研究都十分注重观念的作用。二战后，随着现实主义的逐步精确化和科学化，观念的作用几乎被完全忽视，观念因素也逐步被排除到国际政治研究和关注的视野之外。冷战后，随着文化、认同、规范在国际关系中的回归，观念因素得以复兴。本文意在审视对观念因素认识演化的历史与理论轨迹，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

早期国际关系理论对观念因素的认识

一战催生了国际关系学，起初居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非常重视观念的作用。它主张建立国际议会或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改造国际关系，保障世界和平。而在这种改造中，理性指导下的公众舆论具有决定性作用。[1] 理想主义者最具特色思想特征是高度推崇理性的作用，因而在英国学派中被划归为三大思想学派的理性主义学派。[2] 在他们看来，人类不断的冲突与战争是人类理性被有缺陷的国内和国际制度蒙蔽的结果。战争只不过是一种“理解障碍”。[3](P27) 通过普及教育和公开外交，改变人们对战争可以获益的观念，恢复公众理性，就可以塑造世界和平。理想主义者推崇理性，就是强调正确的观念对国际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战争不过是错误观念所导致的结果，纠正错误观念，恢复正确观念，就可以避免战争，维护和平。

最早对理想主义进行毁灭性批判的“道德现实主义”者卡尔强调权力与道德的平衡，在探寻这种平衡的过程中，观念是其核心概念之一。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性质的认识。他认为，在政治生活领域不存在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事实，只有与不同历史阶段的人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相关联的现状。这种现状会随着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如果研究人员在思维中已经存在改变事实的愿望,并通过他的研究使其他人也接受这种愿望,那么一旦接受的人达到足够的数量,事实就会得以改变。”[3](P5)也就是说,观念不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式反应,它也是建构和改变现实的工具。卡尔对社会事实的这一理解和对观念作用的认识使得卡尔被后来的突出社会本体论的建构主义者和批判理论奉为开山之人。事实上,卡尔思想的最大特征是将辩证法应用于国际关系学研究,他对物质与观念、权力与道德等成对概念的辩证理解使得所有学派(包括那些相互间完全对立的学派)都成为其信徒和追随者。二是关于权力形式的认识。卡尔认为,权力有三种形式,即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支配舆论的力量。它们是“高度相互依赖的”、“不可分割的整体”。[3](P103)所谓支配舆论的力量,是观念范畴的事情,是维护或改变人们观念和意愿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理想主义者和卡尔的道德现实主义虽然都强调观念的作用,但是,二者对观念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物质力量与观念力量的关系上,理想主义奉行的是观念至上论,它高度推崇理性所代表的正确观念,同时极度贬低或忽视权力和利益等物质因素。而卡尔的道德现实主义奉行的是权力与道德观念的折衷主义。他认为,“理想和现实构成了政治学的两个方面。成熟的政治思想和良好的政治生活只能存在于理想和现实融合的环境之中。”[3](P10)在这一折衷主义中,卡尔更注重物质权力的核心作用。他认为,“使用权力、威胁使用权力或是持权待用,都是国际变革中的根本因素”,“国际新秩序只能建立在一个上升大国的基础上”,“实现国际和解进程的最大希望最终在于经济重建的方式”。[3](P196—214)其次,理想主义关注的是未来和“应然”,它以创造性的想象建构思维。其观念是先验的、既存的,他们所做的是使世界适应自己的观念和政策。而卡尔关注的是现实和“实然”,现实世界是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的结合,他所要做的是在社会事实中寻求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的平衡。

二战后现实主义理论演进中观念因素的淡出

二战的爆发意味着国际联盟实践的失败和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破产。随后兴起的现实主义几乎主导了国际关系领域近半个世纪之久。卡尔之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先后经历了两种典型形态。先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之后是20世纪70年代末肯尼思·华尔兹发展的结构现实主义。观念因素在这一发展中被逐步排除在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视野之外。

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的基本逻辑规律是权力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在其著名的政治现实主义六项原则中,摩根索认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现实主义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主要路标”,与此同时,理解和观察国际政治还要“防范两种流行的谬误,即注重动机和注重意识形态倾向”。[4](P5)在限制权力、实现和平方面,国际舆论和国际道德是不可信的。这样一来,观念因素就被权力和利益所覆盖。但是,他最终又以自相矛盾的方式承认了观念的作用。他认为,仅仅借助物质力量,以权力抑制权力的均势是无法保证和平的。“外交是主权国家组成的社会所能提供的维护和平的最佳手段”,并提出了外交的九条原则。[4](P584—590)这九条原则如果能够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共同观念,“世界国家就能使和平更为可靠”。[4](P592)可见,适当的观念普及成为摩根索整个理论逻辑的最后归宿。

然而,自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以来,追求对社会现象进行精确测量与科学解释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大风尚。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演绎与推理见长的经济学方法又开始在政治学与社会学分析中大行其道,[5]受其影响而产生的现代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观念是否发挥作用这一古老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由于行为者能正确地预见到他们的行为结果,或者是由于某种选择性进程确保了只有那些似乎是按理性行事的行为者才会获得成功,所以观念是不重要的,或只是附带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现象。”[6](P4)结构现实主义将现实主义高度简约化和科学化。华尔兹将国际政治运行的基本逻辑概括为“结构决定行为”这一简化模式。在他看来，国际体系结构被定义为无政府状态下物质能力的分配。可以构成社会结构的观念属性或观念关系类因素，如友谊和敌对的局面、国家的传统、习惯、目标、愿望和政府形式、制度等，则被完全排斥于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之外。[7](P131—132)这样一来，它的解释力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只能解释并始终预期国际政治中的均势行为。但是其缺陷在两极体系中被遮蔽了。新自由制度主义企图以非现实主义方式解释国际合作问题，但是它借重的仍然是新现实主义的行为体理性利己的假定，而非行为体观念的转变。[8]观念因素也基本排除在其思维之外。总之，在理性主义模式中，行为体的偏好是既定的，他们关注的只是行为体如何根据环境的变化计算代价的变化从而相应地调整自身行为，观念因素的作用在行为变化过程中基本是被忽略的。

当然，完全排除观念因素的物质主义理论势必造成其解释力的重大缺陷。由华尔兹结构影响行为的简约模式推导出的国家为寻求安全的权力制衡行为模式就无法解释二战后的北约抗衡苏联的事实。因为如果国家制衡的是强大的物质实力，那么被制衡的应该美国而不是苏联。于是，其后坚持新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试图在华尔兹极其简约的理论中加入更多的解释变量，方法往往是把一些未经认可的观念因素杂合在华尔兹理论之中，比如将文化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或是产生威胁知觉的根源。[9](P267)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史蒂芬·沃尔特所提出的威胁平衡理论。他认为，国家结成同盟不是为了制衡“权力”而是为了制衡“威胁”。而威胁判定依靠的是权力、地缘临近性、进攻能力与进攻意图四个指标。[10](P22—26)显然，进攻意图是外生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特有的物质性变量即经济能力、军事技术和地理因素的。[11](P38)虽然沃尔特仍然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向性分析框架，但他对威胁观念的强调，使得他远离了体系层次，从物质能力分析转向了观念因素分析。[12](P27)例如，他认为，一种可能是国家对威胁的判断与意识形态有关，因此，国家将倾向于联合起来反对被视为侵略性的意识形态，而与被视为非威胁性的意识形态结成同盟。[10](P102)可见，沃尔特已经把观念等主观的因素引入，并把意识形态视为同其他因素相互竞争解释力的变量之一。为此，彼得·卡赞斯坦认为，沃尔特的理论不是对新现实主义的修正，而是一个实质性的背离。[12](P27)

冷战后观念因素在新自由主义中的彰显

随着理论论争和国际现实的发展，观念因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逐步凸现。在理论论争层面，20世纪80年代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围绕国际合作问题展开了争论，最终走向了“新—新”趋同。与此同时，被统称为反思主义的非主流学派对主流理论的物质主义本体论提出了质疑，对先验的无政府假定、国家理性利己身份假定等提出了严厉批判。这些批评者认为，主流理论都只注重物质层面，却忽略了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非物质层面，如文化、观念、身份、规范等因素的重要作用。为了回应这一批判，进而修补自身理论体系的缺陷，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观念因素。从国际现实层面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格局突发而和平地结束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不仅改变了国际体系结构，而且冲击着人们惯常的两极结构下的思维模式。主流学派既没有预见到这一重大事件，甚至在事后也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这场“平静的巨变”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反思：[13](P4)以往的理论到底忽视了什么？在这一背景之下，观念因素再次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

基欧汉和戈尔茨坦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他们进一步扩大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对观念在国家行为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在美国社会科学协会的资助下，美国学术界在1989到1991年三年中先后召开了三次关于观念作用的学术讨论会。[14]以此为基础，基欧汉和戈尔茨坦主编了《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对观念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进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行了系统探讨，提出了分析框架，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关于观念的地位与作用，作者提出了以下观点。首先，观念，与利益一样，都是解释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在观念的作用方面，它既区别于理性主义也区别于反思主义。理性主义把观念作用看作是次要的或者是可以忽视的，纯粹从理性算计的视角来解释国家行为，而反思主义者大都具有反实证主义的倾向。本书提出的观点认为，理性主义是一个有价值的起点，但在有些时候必须引入观念才能解释国家行为，而且观念的作用可以通过实证的方法加以检验。[6](P.1-6)第二，观念可以分为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性信念。世界观的不同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看法的不同和行为的不同。例如，如果按照传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所认定的那样，认为世界应统一于某一种神权力量之下，那结果只能是十字军东征式的征服。而如果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主权原则那样看待世界，就会在承认不同国家生存权的基础上出现和平共处。原则性信念即规范性观念，因果性信念即关于具体领域问题的知识性观念。它们比世界观更易于变化，因而也更容易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6](P.10-11)第三，观念在政治中的作用近似于扳道工，决定着受利益驱动的行动运行的轨道。观念通过提供路线图、提供关注焦点和制度化三种途径指导、协调和持续地影响着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6](P.12-24)

基欧汉的贡献在于首次对观念因素给予了精致而系统的分析。但是，他对观念的认识仍然没有超出理性主义的基本框架。首先，它只看到了观念的因果作用而没有看到观念的建构意义。观念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赋予物质因素以意义，影响着国家的身份和属性。其次，虽然承认了观念的作用，但又承认“行动可以在自我利益的基础上，在权力现实的框架中得到理解。”它在因果性分析中最终还是把观念置于物质因素的附属位置。也就是说，首先按照理性主义的前提用物质因素变量来解释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策变化。当物质因素无法做出解释时再引入观念变量。这使得他最终滑到了与他挑战的理性主义方法相同的立场。

冷战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观念转向

早在冷战前，斯奈德、布鲁克、萨拜因等就率先开始研究信仰体系和感知在制订对外政策方面的作用。不过，只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的十多年里，关于身份、规范、话语、文化等观念因素的理论研究才呈现出多彩纷呈的局面。[15](P.119)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紧密相关。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国际政治研究真正转向观念因素。温特在其名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开宗明义指出了观念的巨大作用：“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建构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15](P.1)作为最近兴起的一种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建构主义重申了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地位与作用，并对观念因素做出了不同于理性主义的新解读。[16]

首先，赋予观念于本体意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生活中的大部分事实是一种社会事实而非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客观自然事实。社会事实，即钱、主权、权利等这些并非物质真实的东西，它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人们共同认为它们存在并据此行事。也就是说，社会事实是一种观念性存在，人们之间共同持有的观念建构了它的存在。[17](P.30-64)从本体的意义上看待观念，作为反映主流理论中那些物质性存在的核心概念如无政府结构、权力、利益、安全困境等等都具有了不同的含义。它们也不过是社会事实，是观念性存在，其意义是观念赋予的。主体间共有观念的改变将导致其意义的改变。国际体系的结构是观念结构而非物质结构。结构是观念的分配。共有观念决定了结构的性质，物质力量分配的意义取决于体系的社会结构，具体说就是取决于霍布斯、洛克、康德这三种文化哪种占主导地位。[15](P.24)权力和利益是由观念塑造的。作为国际生活的主要因素，“权力和利益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在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观念使然”。[15](P.49)由此，观念就成了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建构主义研究的起点，具有了本体的意义。

其次，承认观念的因果作用的同时，更加强调观念的建构作用。新自由主义甚至新现实主义都承认观念的作用，问题在于观念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建构主义在两个方面突出了观念的作用。一是承认观念作用的因果方式。在行为体身份给定的情况下，观念发挥着扳道工的作用，引导行为体可能的行动轨道。在此，观念与物质性因素并列成为行为体行动的原因。二是突出观念的建构功能，这是建构主义关于观念作用的核心观点。我们之所以说建构主义更加重视观念，正是因为它所发现的观念的建构作用。正如温特所言，“我提出的第二种方式是社会建构方式，它研究的问题是：观念在多大程度上首先建构了看上去属于物质范畴的原因。正是物质性原因是由观念建构的，所以如果把观念视为与其他原因因素并列的变量，就不能充分理解观念的作用。”[15](P121)

最后，通过转变共有观念，形成集体认同，可以超越安全困境，实现持久的和平与安全。建构主义认为，消除敌意、解决安全困境的出路不在于霸权下的秩序，不在于工具理性主义下的利益核算，也不仅仅在于国际制度的外在约束，而在于长期良性互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集体认同。对此，温特提出的康德文化与奥特勒和巴尼特提出的安全共同体，两个概念在含义是基本是一致的，所描述的状况都是对现实主义所视为不可改变的安全困境的超越。达到康德文化和安全共同体的关键都在于集体身份如何可能形成。温特提出了我国学者已经熟知的影响集体身份形成的四个主变量：相互依存、同质性、共同命运和自我约束，尤其强调自我约束的关键性意义。[15](P430—454)通过这四个变量来测度的集体认同，其实就是如何把行为体的单纯利己观念转变为利他的观念。更准确地说，就是如何扩展自我认同的观念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他者。由此可见，观念对于国家间安全困境的超越是至关重要的。总之，“正是认同的逻辑而不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对哪样的国家被视为国家的潜在或现实威胁提供了更好的解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之间并不总是陷入安全困境之中，而是有可能建立起安全共同体。[12](P401)

结论

沿着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的演进轨迹，可以发现，从早期理论中对观念因素的高度重视，到二战后的逐步淡出，再到冷战后观念因素的彰显与转向，对观念重要性的认识与理解走过了一次历史轮回。对此，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由于其所处的历史与知识大背景，理论有时可以忽略或贬低观念的作用，但是，在以人为中心的活生生的国际政治实践中，观念的作用是客观存在不可否认的。正如韦伯所言，“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是物质和观念上的利益，而不是观念。然而，常常是观念所创造的‘世界意象’如铁路上的扳道工一样，决定着行动在利益动力的推动下运行的轨道”，[6](P49)“观念几乎是无所不在的”。[15](P168)因此，在认识层面上，我们必须改变那种轻视观念而片面强调物质力量的错误倾向；在实践层面上，必须注重观念这一有力的工具，善于甄别正确与错误的观念，及时对自身观念做出适宜的调整，在双边关系及多边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积极参与和平、合作、发展等观念的建构与传播。对于研究者而言，观念的变化与演进、冲突与融合，无疑为我们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的现实变化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权力与利益的深刻的新视角。

[参考文献]

[1] 边沁.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 时殷弘.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M]. New York: 1992.

[3] [英]爱德华·卡尔. 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 秦亚青.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4]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gle for Power and Peace (Six Edition)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5] 苏长河. 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J]. 国际政治研究, 2006(2).

[6] [美]朱迪斯·戈尔茨坦, 罗伯特·基欧汉. 观念与外交政策[M]. 刘东国, 于军.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 [美]肯尼思·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M]. 信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8] [美]罗伯特·基欧汉. 霸权之后: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 苏长河, 信强, 何曜.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9] [美]约翰·杰拉尔德·鲁杰. 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 ——新功利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A]. 彼得·卡赞斯坦, 罗伯特·基欧汉, 斯蒂芬·克拉斯纳.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C]. 秦亚青.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0]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 Jeffrey W. Legro,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Autumn, 1999.

[12] Peter J. Katzenstein. The Cu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 郭树勇. 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M].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1.

[14] 刘东国. 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对《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的解读[J]. 外交评论, 2005(6).

[15] [美]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6] 秦亚青. 建构主义: 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J]. 国际政治研究, 2006(3).

[17] [美]温都尔卡·库巴科娃. 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M]. 肖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齐琳)

·学术信息·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观点

秦亚青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题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一文中, 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生成提出了三个观点, 他认为: 第一, 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可能的: 社会科学理论的地域文化特征是其抹杀不去的胎记, 所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是可能产生的; 第二, 中国学派有着丰富的三大思想渊源: 2000年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的实践、150多年革命思想和实践以及27年改革开放思想和实践; 第三, 中国学派产生不仅可能, 而且必然。中国的迅速发展, 重大的社会转型, 深刻的观念变化, 使我们开始解决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归属困境, 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根本性辩论和实践必然导致中国学派的生成。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与所谓的本土化的概念不完全一样。本土化虽有本土理论发展的内涵, 但在某种程度上, 也含有落后的社会通过学习借鉴先进社会的已有理论, 用以解释本土现象的理论。比如, 在国际关系领域, 可以说中国化的现实主义、中国化的自由主义、中国化的建构主义等。其结果至多只是西方理论的地方性解释和验证。社会理论的本土意识和本土特征则具有相反的意思。它强调理论是在本土文化中诞生的, 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沟通中发展起来, 不仅化他为己、以己化他, 而且他己融合, 普及天下。这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真正含义。

(佑军)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